

“感谢”沙尘暴

文 / 汪永晨

刘书润是在我们“绿家园志愿者”一月一次的记者沙龙上说的感谢沙尘暴，同时被他感谢的还有污染。当时，是我不知趣地向大家解释，刘先生说的感谢是带引号的。其实人家刘先生并不需要我的解释。

生态学与人情味

和刘书润相识是在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2000年12月在深圳召开的一次会上。那天，当我知道坐的一车人不是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者，就是植物学家、生态学家时，就把自己在制作广播



节目中遇到的一个不懂的问题拿出来向各位专家们请教。我问的是，什么是维管植物。一车的人都在解释，但谁也没能让我真明白。这时坐在我前面的一位，如不是在会议代表的专车上，会被我误认为是老农的人，慢慢悠悠地说开了：

“维管植物包括蕨类和种子植物，这些植物是比较高级的，需要一个专门的疏导组织运输水分和养料，有这种器官的植物，就叫维管植物。为什么单独划分出维管植物？就因为它是比较高

级、生态作用比较显著的一类植物。”

这一板一眼的解释，使我在一车人中，就记住了他。不过，解释什么是维管植物，刘先生虽然让我知道了老科学家治学态度的认真，但后来他的有关生态旅游的讲演，却又让我知道了他讲课时的死板，他又成了那么多讲演者中只让我记住的讲演者。当时我想，这死板，可能和他的认真分不开。

也就是这份死板，让我在一段时间里，无论如何也不理解熟悉他的人对他的评价：刘书润，讲起他生活在草原上

这么多年的故事来，生动极了。

就是这个初识让我觉得这位老农模样的生态学家，后来使我对他的认识，一直处在“进行时”的状态。

我又一次修正对刘书润的认识，是2002年4月在我们的记者沙龙上。老先生上来就说：目前人人都关注生态环境，生态学成了无所不包的东西，所以

保护区内外植被在恢复，而区外已出现了沙化 杨树田 摄
The scenery inside and outside the reserve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.



我要感谢污染，感谢沙尘暴。老先生还说，上世纪60年代他学生态学的时候，要想查查什么是生态学，非得到大图书馆才能查到。现在呢：生态总统、生态国家、生态省、生态县、生态村，甚至化妆品也是生态美。生态被炒得如此之热，刘先生说了，能不感谢沙尘暴，不感谢污染吗？而从另一个意义上讲，他老人家又说了，这似乎又不得不让人觉得，生态学本身是不是也受到了污染？

是呀，刘先生的感谢不是没有道理。不是污染，生态能炒得这么热？不是沙尘暴，刮起来昏天暗地，谁整天把它挂在嘴边上。可这一挂，生态学本身无形中也掺进了沙子。

闹了半天，刘先生的感谢，不仅仅是带引号的，而且很有几分讽刺、挖苦的意味。学者就是学者，在不论什么都冠以“生态”的年代，刘书润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，没有加入这一高声齐唱的行列。

刘先生认为生态学的概念是：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，是一门关系学。生态在环境中不是单独存在的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。生态学原本是比较深奥的实验科学，可它又有接近大众的一面，这使它又成了有人情味儿，充满爱心的东西。那天的记者沙龙上，我注意到，当听到他把生态学比喻成有人情味儿，充满爱心的东西时，记者们有点犯傻了。

在刘先生的学问里，把生态学分成两大部分：一个是哲学生态。其中包括生物多样性和种群间的关系，这中间充满了变化。所以刘先生认为，生态治理跟一般的治理不一样，要考虑到这中间复杂的关系，就跟中医治病似的，不是头痛医头，脚痛治脚；另一部分是文化生态，这是生态学里的情感部分。这一部分被刘先生形容成：讲究和谐、宽容、爱心。刘先生说到生态学提倡和谐时，记者们没有提出疑义。可他接下来说的，却有不少人不敢苟同了。他说：一般的生态学家不太讲可持续发展，因为没有可持续的事儿，这本身就违反哲学，人这个物种也会毁灭。什么事物都

有产生、发展、高潮、最后灭亡，这是规律，持续不是规律，太过分的强调持续发展必然会带来环境问题。现在都讲生态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，而往往忽视了文化效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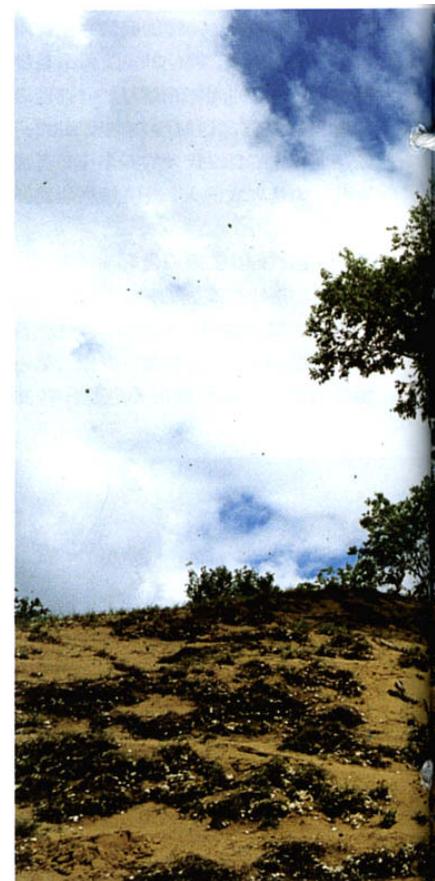
看到记者们还是没明白自己的意思，刘先生举了个例子。比如北京四合院，人们把它拆了盖大楼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有了，但文化效益出了问题，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，楼房就不如四合院。所以搞生态学的，要考虑到全面，要强调人情味的东西。

生态学，还要讲人情味，要不是和草原打了几十年的交道，刘先生说自己也是总结不出这一条的。文化革命时，人人都在大闹革命，老先生可好，背着个破书包不辞而别，走进了牧民们的蒙古包。因为整天拿着个指南针，他曾被人当成特务给逮着了。逮着他的小战士当时大喜。抓到了特务，那可就有了立功的资本。

刘先生说到自己的这些经历，那可就有滋有味了：牧民的家，是草原上的人共有的，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，睡到哪里，在那些日子里，我成了牧民们最好的朋友。对游牧文化也有了深刻的认识。

近年来，北京春天的沙尘暴，让人们一个劲地从生态遭到了破坏上找根源。而刘先生说了：草原破坏，最根本的是文化问题。为什么？蒙古族人过去也是种田的，后来为什么不种，改放牧的了？原来他们放牧也是圈养，后来怎么改游牧了？这是多少代蒙古族人最终选择的生活方式。游牧可使草原休养生息。住在草原上的人和牲畜都很少生病。为什么？即使生了病也很少看医生，为什么？因为搬一次家，一些寄生虫就留在了原处，新的草原，新的空气，新的河流，万物都有了新的生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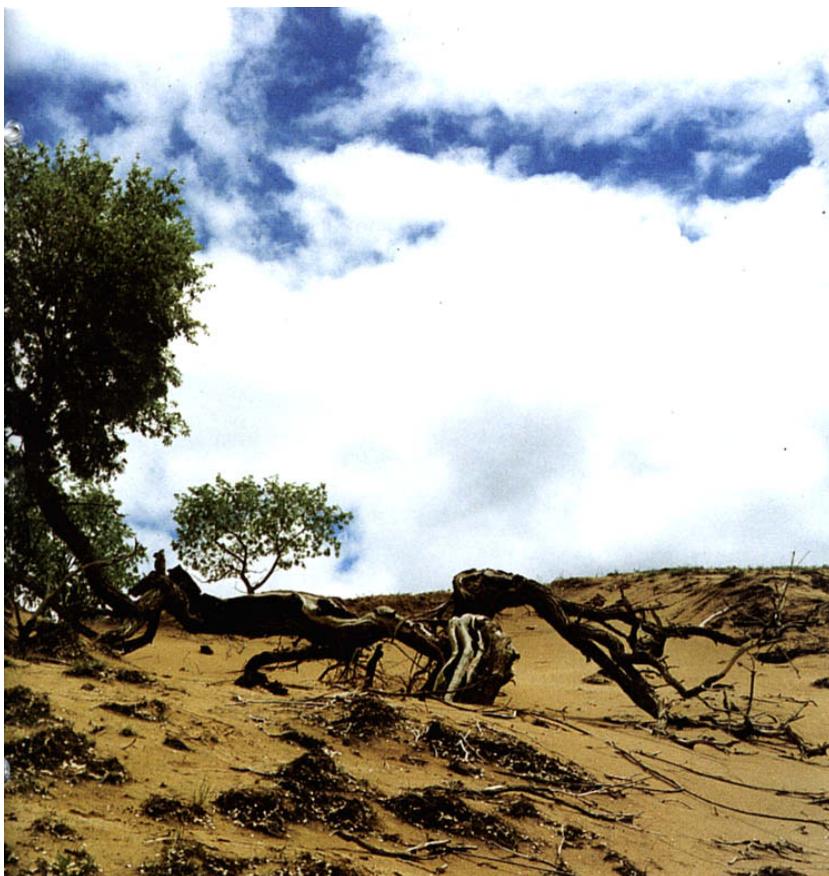
记者沙龙上，刘先生说到这儿，很多记者又表示疑惑。草原上为什么就能很少生病，空气好？刘先生又慢慢道来：牧民们差不多都是七天搬一次家，换新地方。很多寄生虫在七八天内还没有繁殖后代呢，人家就搬家走了，没



给寄生虫留下繁衍生息的功夫。即使繁殖了，人到了新地方，一些寄生虫没有了原来生存的环境。再说了，草原上的草，本身也有灭菌、净化的作用。有人做过试验，脑炎、肝炎等十几种人类的致病细菌，不能在那里繁殖。有人研究，草原的消毒作用也是同样巨大的，这和生物链有关，没有人为的干扰，生态在那里得以平衡发展。

刘先生对草原真缔的认识，始于中国还处于靠票证供应的年代。那时没钱还不如没粮票让人着急。而他，什么也没有，并且是在没有经过别人允许的情况下，就自己在牧区转开了。按牧区人

顽强的生命 马天烈 摄
A tenacious life.



的习惯，要是有人骑没有鞍的马，或是步行，都有可能是坏人。

一次，刘先生步行在达里诺尔湖畔考察，当时下着雨。一位过路的司机看到有人在走着，马上提高了警惕。他让刘先生上了车，目的不是让他搭个脚，而是要好好盘问盘问，最后还是出于保卫草原安全的考虑，把他送到了军马场保卫科。好在那里的人，早就认识了这位背着破书包，可谓独行侠的科学家，才把他给放了，并赏了好酒、好饭、好菜。

在草原上搞研究，采标本是必不可少的，采标本，又很难走正道。这不走正道，就有了误闯军事要地的风险。有那么一次就是不留神，刘先生被人家抓了个正着。个头不高，穿得破破烂烂，最要命的是，破书包里的词典上有洋文，

外加上地图、尺子、指南针等等，抓着他的小战士乐坏了，起码也能立个二等功吧。接下来的细细盘问更是让小战士喜形于色：呼市的市长是谁？整天和草打交道的刘先生，哪知道市长是谁，市长也不管他，离得太远。不知道市长，那呼和浩特的百货商店在哪儿？百货商店和刘先生也没什么关系呀，他一天到晚在牧民家蹭吃蹭喝，衣服就那么两件，还不知要穿它多少个夏秋冬春呢。那现在城里在流行什么歌曲？刘先生爱的是草原，爱听的是草原上的歌，城里人唱什么歌，可就不知道了。听到这些，尽管刘先生当时带着自己的户口簿和学校开的证明，急于要立功的小战士还是认为自己这回可是十拿九稳地有了把握。直到连长重新过了堂，再次研究了刘先生带的各种证明，又聊到了共同认识的

老额吉（蒙语：妈妈之意），他才算是逃出了小战士的手心。

在刘先生看来，生态学的人情味，在草原上的体现，除了草原人为了适应游牧，制定了很多村规民约以外，就是编了很多歌儿。

要想了解一个民族，得从民歌开始。刘先生对此坚信不疑。他会不会唱歌，我没听到过不敢说，但在草原生活的日日夜夜，让他对草原上的歌儿，有了草原人一样的感受。他说自己如今是：一听到蒙古歌，特别是长调歌曲，“蓝蓝的天空上飘着白云，白云的下面散布着雪白的羊群”，草原就展现在眼前。刘先生说，草原上的歌是游动的白云，是无边的绿草，是奔腾的马群，是滔滔的江河。

草原上的四季歌唱的是：春天到了，草儿青青发了芽，本想留在春营地，故乡荒芜，路途遥远，我们还是走吧；夏天到了，百花齐放，本想留在夏营地，故乡荒芜，路途遥远，我们还是走吧；秋天到了……刘先生说，这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人，劝牧民不要眷恋，不要偷懒，该走的时候就要走。

草原上人与雁的对歌是：

人：吉祥欢乐的夏天，你们大雁自由飞翔，为何来到塞外草原？

雁：冬去春来四季循环，南方的炎热催我们归还。

人：正值金秋美好时节，为何却要奋飞向南？

雁：为了躲避北方的严寒。

刘先生说，这些歌都唱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唱得不是以人为中心，人凌驾于自然之上。唱的是，人类是在自然的怀抱中繁衍生息。

可是让刘先生遗憾的是，蒙古族的祖先就懂得，我们草原地区生态比较脆弱，只能轻度放牧。而我们现在却非把游牧当成愚昧，当成落后，以农耕文化给予了取缔。

从刘先生对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认识中，我开始懂得他所说的生态学里有人情味是什么意思了。当然，这份懂得也还是在“进行时”中。

地球是五颜六色的

2002年6月12日,我来到了刘书润先生如此眷恋的内蒙古大草原,登上了遍及他的足迹的赛罕乌拉,结识了他的学生和与他交上朋友的当地人。

张书理,学生时代就整天听刘先生讲草原,写毕业论文时,刘先生本不是

发现;弄懂生态系统,就要讨论,要切磋,这一切碰,被刘老师给形容成了交头接耳,张书理说,形象,受用。

赛罕乌拉,让我第一次领略了内蒙古罕山的美。也时刻领会着刘书润说的:地球本应是五颜六色的。我们从赤峰驱车前往罕山时,沿途看到了八百里

茅、贝加尔针茅和克氏针茅的区别。刘先生给他的回答是三个字:查表去。因为那次出野外张书理没带表,过了两天,趁刘先生高兴时,他又问了一遍,刘先生给的还是那三个字:查表去。当样方做到非得区分这三种植物时,没带分类检索表的张书理咬着牙又问了一次刘



他的指导老师,出于崇拜,他的论文写完后,第一个拿给看的是刘老师。虽然跟着刘老师搞调查,走路时要走“歪门邪道”,坐车要“左顾右盼”,认识草原时要“交头接耳”。爬了一天山了,还要时不时停下来做样方,不让歇着。张书理说,自己今生还是会争取一切机会和刘老师一块走进草原。老师传授的治学态度,已刻在了他的骨子里:搞植物调查,只有走歪门邪道才可以看到更多的新东西;认识草原,就不能忽视任何机会,坐在车上时瞎聊天不行,那是浪费时间,必须左顾右盼地去看,去找,去



旱海,景色不可不谓蔚为壮观。但是,那是苍凉的美。路两旁,一排排,一片片的人工林,不可不谓让人钦佩,但是,那种色调的单一,也会令人看得疲惫。

大自然的景致本是丰富多彩的。天然系统,是大自然多少万年磨合而成的,里面存有很多信息。在我们人类还完全做不到模仿自然的生态系统时,东施效颦似的种树,带给草原的不能不说是一种牺牲。这是我与刘先生以“进行时”相识的过程中,产生于自身的体会。

而在张书理的记忆里,有这样一件事也是让他受用一辈子的。

那是他和刘先生一块在赛罕乌拉做样方,也就是以一块草原为单位,记录下这块草地上有多少种植物乃至它们的结构和特征。当时张书理问刘先生大针

先生,得到的依然是三个字:查表去。

做为学生,张书理在以后的考察中,再也不敢把该带的东西不带全,再也不敢在调查中偷懒,不自己认真调查考证而依赖别人了。同时被他永远记住的还有,大针茅的颖果长超过11毫米,贝加尔针茅的颖果是11毫米,克氏针茅的颖果小于11毫米。

刘先生认为,目前的西部建设中,由于缺乏对西部的理解,提出的一些建设方式难免草率。做为一名生态学家,刘先生除了不同意什么都挂上生态,不同意以农耕文化取代游牧文化以外,他还提出,什么是西部?西部是:江河源,水土源,民族源,文化源。中华文化的底蕴有不少都在西部,中华民族的母亲在西部。我们的母亲虽然苍老一些,不太秀美,但是,母亲就是母亲。

(左)在野外考察的刘书润教授 李晓辉 摄

Professor Liu Shurun.

(右)湿地草甸 杨树田 摄

The wet meadow.

西部大开发，刘先生认为，不仅要看到它的矿产资源、土地资源，最主要的是应该是开发西部的文化底蕴。西部在文化方面的资源要比矿产资源的根源更深。所以在开发西部时，除了要增加科技含量外，还应该增加文化含量，增加情感含量。

文化不会单一，总是丰富多彩的。文化生态，在神山前寻古思今时，我试图寻找的，更是刘先生对此说理解的真谛。

刘先生告诉我，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，最早的龙玉雕，出于内蒙古。中华民族裸体的圣母像，存于西部的文化

信。就连他认草，认树也像。拿起来在嘴里嚼嚼，在鼻子前闻闻，在脸上蹭蹭，就知道是什么。有一种植物叫辣蓼，他让我尝过，好家伙，我一尝，真比辣椒还辣。草原上那么多植物，刘老师就是这么一种一种认的。”

和地球一样，刘书润本人也是多彩



刘先生那天在记者沙龙上谈到此时，脸上露出了颇多的遗憾：很多人现在提到西部人，似乎感觉就是傻乎乎的，落后，原始，野蛮。开发西部，应该是到了人们改变对西部认识的时候了。我搞生态学，更希望强调文化生态，更强调生态的色彩。

在我的赛罕乌拉之行中，我两次探访一千多年前辽王祭祀的神山。站在神山前，望着地上拱起的土堆，古老宫殿的回廊，望着躺在地上无言的大理石柱础，望着撒落于四处的残砖断瓦，默默的我，感受到的是，辽代的先人向我们现代人传递的文明信息。宫殿无声，四面陡峭的石壁、大山做证；石柱无言，地上长满的串串大黄花，芍药在雨中轻语；砖瓦无奈，却在风中相互碰撞时，发出叮当作响的回声。

中。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，最长的长城，最古老的长城，延续朝代最长的长城，都在内蒙古。京戏的主要乐器是胡琴，胡是哪儿来的？唱京戏穿的马靴，马靴是什么，就是蒙古靴。就连北京的胡同，胡同一词也是蒙语。

如今，内蒙古大学珍藏的植物标本中，有许多是经刘先生之手采来的，同时被刘先生采到的，还有民族文化、中华文化的精髓、生态文化。

巴特尔，现就职于赛罕乌拉生物圈保护区。那天中午，坐在保护区平房里的火炕上，他上来就和我说，当年他们盼着草原生态专家刘书润来时大家就猜，这大专家会是什么样呢？来了后，巴特尔说到这儿时降低了嗓门，像是怕被谁听到似的：“来了后觉得这哪是大专家呀？怎么看，怎么像我们这儿的羊

的。

说他像羊倌的不只是我，巴特尔强调。据说有一次他被请到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做讲演，接他的人和他一块进宾馆，把门的就把他给拦住了，穿得那样，还背着个破书包，人家不让进。后来主办单位的头头出来解释：这就是我们请来的最重要的客人。刘先生被请进去了，那个把门的却还死盯着他的背影在那琢磨，他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个人和教授联系在一块。

更邪的还有呢，巴特尔说。一次刘先生坐长途车外出考察。车上碰上了车匪路霸。这伙人对别人是挨着个的要钱，对刘先生，人家只是说了声，嘿，起来，起来，让我坐会儿。刘先生从破书包里拿出工作证对那小子说，我需要休息，我有工作。那位看了工作证上教授

头衔的署名后，立马肃然起敬，连自己的位子也让了出来，让刘先生躺着休息。

刘先生背得那个书包实在是太破了，里面装的还有考察用的高级相机。一次，张书理劝老师买个新的。刘先生说了，我这破书包没人惦记，谁会想到这里还装着如此值钱的玩意儿呢。

刘先生说，当年教过自己的雍老师就说过，有两本书一定要读，一本是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另一本就是《自然辩证法》。而我们现在从事生态研究时，违反辩证法的事例太多了。

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：18世纪在德国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当时种植黑麦是德国整个国家的命运所在。可一度黑麦遭到一种虫子的危害。本来那里有一种鸟，专门吃虫子。而这种鸟又被一种老鹰所制约。缺乏生态常识的德国人，当时很难了解自然界里的这些奥秘，为了让黑麦大丰收，把老鹰消灭了。结果食虫鸟因没有了天敌而过剩。食虫鸟多了，虫子没了，维持了几年的大丰收没能持续。因为虫子都没了，食虫鸟也无法生存而几乎绝迹，致使生态系统全乱了。最后怎么办？还得把老鹰请出来。老鹰出来以后才又维持了食虫鸟的正常种群。人们开始提出疑问，老鹰，是食虫鸟的天敌还是天友呢？

依辩证的观点来看，刘先生对现在令很多人大伤脑筋的草原鼠，也有自己的看法。他说，在草原上，都说老鼠是一害，我调研的结果，老鼠在草原上是非常必要的，它可以翻动土壤，加速牧草生长速度。狼一度也被人们认为是有害的，要消灭掉。狼在草原上是干什么的？它的走动，能够提高牲畜的警惕性，有利于牲畜的健康成长。假如没有狼，黄羊都成了大胖子，走都走不动。所以蒙古人知道，狼可不能消灭，这是草原人对生态系统，生物链最朴素的理解。天敌跟天友不能截然分开，大家都是地球村里的普通成员，也都是生态环境里必要的成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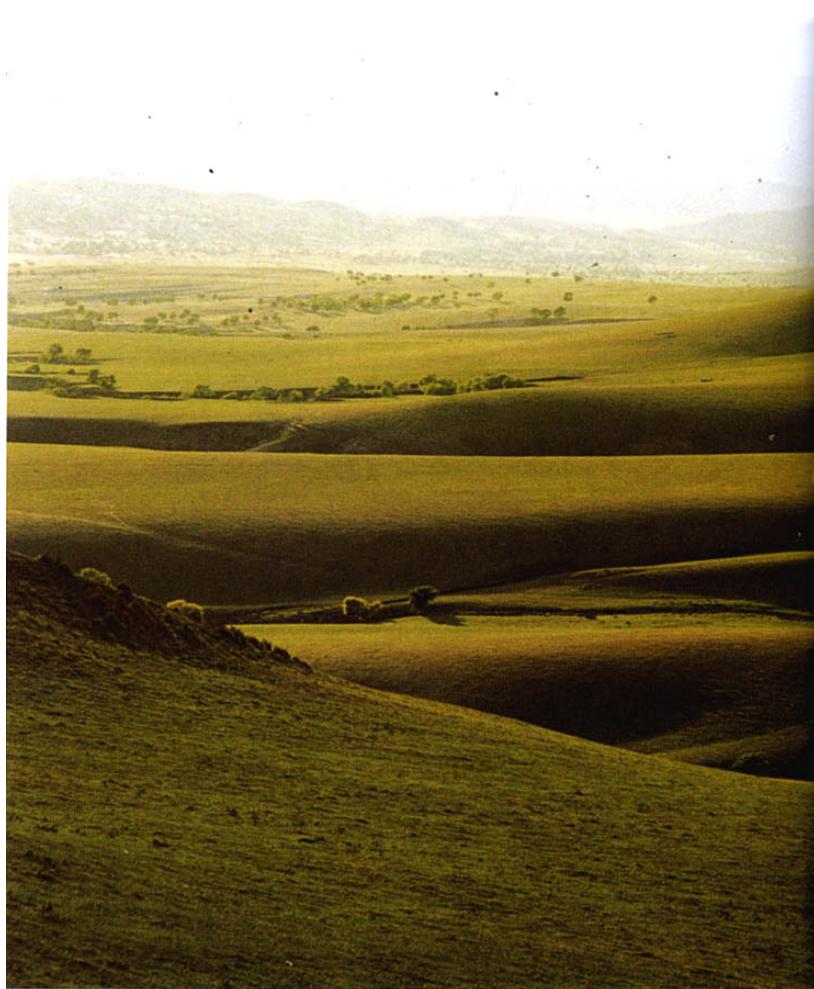
地球是丰富多彩的。这句话，是刘先生的口头禅，也是他文化生态的精髓

所在。

那么，刘书润关于地球是彩色的之说，让今天对自然仍缺乏了解的人，甚至让眼光并不那么长远的人认识起来，当然也需要时间。不过，我想如果说得夸张一点，时代不同了，今天的刘书润，不会是昨天的哥白尼。

在记者沙龙上，刘先生观点的标新

回归大自然。所以，火是整个生态系统运转的催化剂、推动力。把推动力防了生态怎么转？森林里全是枯枝落叶，一旦着起大火，石头都烧焦了，整个系统更完了。防火，防火，将酿成不可收拾的大火。我们拿出那么多钱防火，还不如拿出少一点的钱放火。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，也是像我们一样一天到晚



立异，还包括他的着火说。他说，自己分明记得，上世纪50年代一个月大兴安岭要着很多次火。现在闹一次就是火灾了。依他的观点：火，在整个北方地区，跟阳光、水分同样重要。因为北方天气冷，冬天那么漫长，枯枝落叶很难

的防火，后来他们变了。认识到了火是管理森林系统的一个武器。现在，我们应该从生态学上研究火生态。

火生态，自认为是环保发烧友的我，虽然早几年就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看到了那儿被火烧过的森林里，正萌发

着的勃勃生机。但是做为一种学说，这还是第一次听到。

没有对生态系统深刻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，谁敢如此大胆地建立这一学说。刘书润敢，那是因为他读懂了草原，读懂了草原的生态系统。而我对他这一学说的深刻感悟，不能不感谢于走进赛罕乌拉，走进内蒙古大草原，看到目前

不是什么坏事。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中，没有西北的干旱就没有东南的湿润，正是西北的干旱，形成了一个气压差，才使得中国的亚热带那么好。没有西北的沙尘暴，就没有我们中华民族中原地带深厚的黄土。搞生态的人，不要说内蒙古生态恶劣，要说脆弱。生态治理不等于绿化。生态治理更不等于种树，树不

小白布口袋开始的。小白布口袋里装的是从一个个别方中采集的花花草草、针针叶叶。刘先生坚信，大千世界由它们组成，缺了谁也不行。它们可以告诉我们大自然的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。

我们真的不能再让唯一的绿色遮住双眼。这是我从赛罕乌拉回到北京后，想要和朋友们说的第一句话。在与刘书润相识的“进行时”中，这也许是我最大的收获。

在赛罕乌拉时，我走进了两户牧民的家。男主人都告诉我，他们小时候的赛罕乌拉不是这样，草长得有多高，花开得有多大。游牧时的生活，至今仍让他们眷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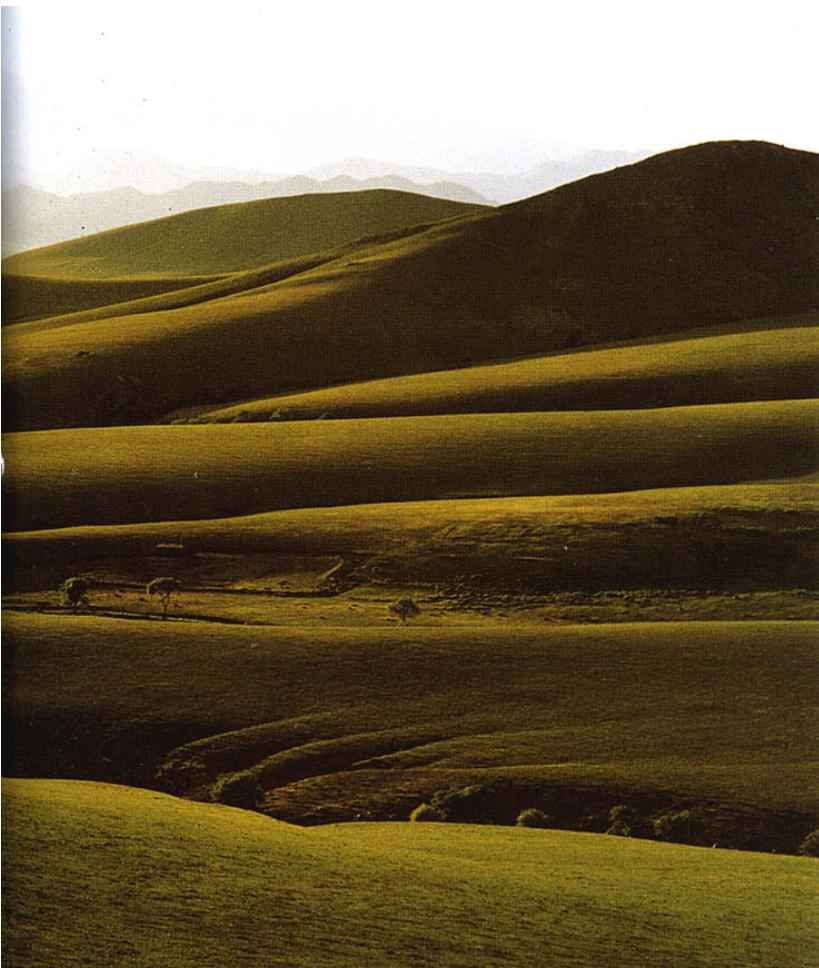
今天的赛罕乌拉，我们不可能再感受刘书润曾感受过的那牧歌似的浪漫生活。却感受到了巴达马司楞老阿爸的妻子，悄悄地把我们在草原上走湿的鞋子放在炕炉上，让牛粪燃起的火烘烤时的温情。

6月，色彩还没有丰富起来的赛罕乌拉，也没有让我看到那里的五颜六色，但是在呼日勒巴特尔家里，我录到的那一首首牧歌中，我听到了牧民们赞美中的罕山，它的丰富，它的秀美，它的和刘书润认识中的大自然的色泽的吻合。

我离开赛罕乌拉时，正赶上2002年的端午节，那里家家门口都挂起了一串柳枝，柳枝上挂着个葫芦，当地人告诉我，是为了避邪、保平安。这浓浓的风土民情，已被很多城里人忘却了的时候，在罕山，在内蒙古，却没有被人们遗忘。

生态文化是有人情味的，地球是五颜六色的，如今远离乡土的人们，要想热爱大自然真的只能“感谢”沙尘暴”吗？

在这点上我想和刘书润先生唱个反调。依我看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自然吧，在大自然里，我们会懂得应该感谢谁。



过于单调的绿色。

色彩和生命息息相关，黄石公园里的颜色是丰富的，黄石公园里的动物也是你追我跑的。而今天的内蒙古大草原，今天的赛罕乌拉，连狼都是稀罕物。

在刘先生看来：内蒙古是干旱区也

是万能的，我们不应背上绿色包袱。人为的制造绿色沙漠，是我们人类在没有读懂大自然的天书时，犯下的又一错误。

要读懂大自然的天书，这豪迈的志向，刘先生是从装满破书包的那一个个

罕山南麓草原 马天烈 摄

The grassland on the southern slope of the Hanshan Mountain.